

回應

卓新平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

大體來看，基督宗教在香港發展有典型的意義，上述發言既是對過去的回顧，也是對將來發展的掌握。基督宗教在香港，一方面代表基督宗教與中國社會的政治相遇。由於帝國主義的列強政治侵略，鴉片戰爭和不平等條約，以及隨後香港的割讓，基督宗教的發展正處於中國近現代發展政治鋒口之中，以致基督宗教在華揚教留下了歷史陰影，由此我們可意會到基督宗教在華發展的敏感處境，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在中西政治文化的責任和作用。

在香港回歸中國進入廿一世紀的當代，基督宗教有其使命與義務，走出以往歷史，達至更新和超越。香港今天作為大都會，作為社會、經濟、文化相遇交匯的最重要場景形式下，發揮社會關懷與社會服務的優勢，並在中

國處境中起了橋樑和溝通的作用，從而在政治意義上寫下全新的一章。

另一方面，基督宗教承擔了中西文化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的重要使命。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文化在以往歷史相遇中多有碰撞和衝突，因而保持了彼此的張力，但在香港基督宗教也有適應中國文化的轉變和融合西方文化中，也對中西文化多有建樹。今天在全球化的處境中，文化對話與溝通已成為主流，香港教會今天在文化對話中有此重要的定位，使基督宗教可以融合並豐富中國文化。在香港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對基督宗教文化起了持久的作用，以達至文化共融和世界和平發展。因此，中國基督宗教研究學者們藉此良機祝願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大有作為。



蘇成溢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

我們在此不難發現有不同宗派的傳統，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同一根源，不同傳統。今天諸位講員都帶出同一目標，就是讓我們周遭的人活得更幸福和有價值。作為牧者，很快想到教會存在的目的？我想到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無論天主教會、東正教會或基督教會，我們均有一個共通而普世的目標，就是為人類豐盛的生命共同努力。本人相信教會無論過去或將來，最要緊的是為人的生命而工作。生命的工作是建立生命。每當看到人的需要便作出回應，人活得幸福與快樂。在我們眼中，人人生來平等，當他們發出需求



的聲音，我們便樂於關心，並伸出援手，解決他們生命上的問題。另一方面教會也致力培育生命，不論人的家庭背景，我們都給予發展的機會。鄭大主教提及聖公會在早期已開設聖保羅書院，中華基督教會由馬禮遜牧師於1818年創立英華書院，都是培育人才。當年香港經濟艱難，教會提供基礎教育，讓青少年學會一門手藝。另外，更重要是教會也致力塑造生命，為人帶來信仰與道德。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教會的目標。

究竟教會在香港的處境中，人們看待基督宗教？

教會從前與現在社會各方面積極參與，在今日香港的文化價值上，反映出基督宗教的特質，例如：尊重人權、公義、正直、仁愛，憐憫。另外，教會為香港製造許多人才，無論貢獻於哪種職業，很多都曾受教會學校的教育，教會引入西方教學的模式，教導香港青少年信望愛精神，幫助他們學習真善美及捨己為人的精神。此外，更為香港社會帶出多元化的服務，達至全人關顧，關心人身心靈的需要。這均是教會在社會的角色與貢獻。

回顧過去，審視現在，教會更須關心將來。不同的講員提出不同的挑戰，在過去教會在各方面投入貢獻，然而，昔日教會所擔負的角色，在未來教會應作全面檢討，應堅持甚麼？放棄甚麼？此外，教會在未來的角色又該如何？教會是先知？還是復和者？是祭司還是僕人？是走進建制內還是建制外？盼望基督教研究中心能與教會並肩合作，給予教會更多寶貴的意見去繼續實踐為人帶來豐盛生命的工程。



邢福增教授（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今天四位講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檢視了基督教在香港的情況。雖然四人的角度不同，重點也不一樣，但綜合而言，我們可見他們幫助我們從四方面——「全球」、「中國」、「政治」、「宗教」——來思考香港基督教的發展。

第一、是「全球」因素。蔡醫生勾劃了當前世界的不同趨勢，並引導我們思考這些趨勢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他認為，廿一世紀的香港基督教，能否有效回應這些全球趨勢，特別對今天以至未來的青年人的思想，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承認，基督教如何「本地化」，回應本土的需要，一直是教會歷史很重要的課題。但蔡醫生提醒我們，可以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認識香港基督教身處的處境。普世教會對全球問題的回應，也可以我們一些啟迪。同樣，香港教會的經驗，也對普世基督教有所貢獻。

第二、是「中國」因素。香港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在「一國兩制」下回歸中國。香港歷史總是跟中國的發展不可分割的。陳樞機提及香港天主教所背的不同包袱，其實都是

中國天主教發展的重要課題。鄺大主教亦告訴我們，原來基督新教在香港的百多年發展，一直都是在不同程度受到中國發展影響的。相對於天主教及基督教在香港擁有較長久的歷史，正教會普世牧首教區（Ecumenical Patriarchate）設立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教區，剛好十年（1996）。聶主教的文章亦指出，整個考慮也具有中國因素在內。其實，正教會莫斯科牧首教區亦於2005年3月在本港重開堂區。負責的神父除了香港外，也要牧養北京、深圳及哈爾濱的正教信徒。所以，要了解基督教在香港的故事，便不能不認識基督教在中國的故事。蔡醫生也強調，廿一世紀是「龍世紀」，中國的崛起必然對基督教帶來挑戰。

有趣的是，檢視當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可見天主教與基督教被列作中國政府承認的五大宗教內。而正教則僅局限於內蒙、黑龍江等個別地區。據悉，國內的正教信徒及俄羅斯正教方面正爭取恢復正教在中國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梵蒂岡與中國政府間的關係，也是多年來引起廣泛關注的重點。中梵關係及中國正教會正常化等問題，當然在本質上屬於中梵及中俄的外交關係，但是，香港在其中，又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此外，隨著香港回歸，香港基督教亦與中國內地基督教有著特殊的發展，例如，中國基督新教自1958年實行聯合崇拜後，現在已進入宗派後時期，但香港基督新教仍是宗派林立的局面。香港天主教會仍是中國領土上跟梵蒂岡維持密切關係的教區，上僅存的教

區。雖然香港宗教與內地宗教要按三互原則發展關係，但這些特殊的形態，對中港基督督教的互動，會是很值得探討的。換言之，香港在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中，是否可具有特殊的角色與地位？這是我們可以更多思考的。

第三、是基督教會與政府關係，這又以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情況為主。陳樞機指出，歷史上天主教的傳教運動，與保教權有密切關係，而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成立，也反映出當時欲擺脫葡萄牙保教權的因素。香港教區草創時，也承繼了禮儀之爭的定案，而禮儀之爭的本質，就是皇權與教權的衝突。後來，天主教在香港積極回應社會的需要，跟基督教新教一樣，逐漸與香港政府建立了伙伴的關係。不過，陳樞機及鄺大主教不約而同地指出，現時基督教會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正面對著新的挑戰。過去曾有一種說法，指基督教會由於成為政府的伙伴，所以變成維持建制的保守力量與

統治工具。對於這種批評，我個人並不同意。並且更深深感受到，在我們沒有充份整理香港教會的歷史前，便為歷史作出蓋棺定論。政教關係的發展，在香港基督教的發展過程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第四、我們在檢視基督教在香港的發展，信仰及神學傳統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畢竟，基督教也有其獨特的信念及使命，我們不應把教會歷史約化成為政治史及社會史，而忽略了其宗教的因素。陳樞機在文中，特別強調了梵二對香港天主教的改變。鄺大主教也分享了聖公會不少先賢的信仰精神，例如在100年前丙午風災殉道的霍主教及四位神學生。香港海事博物館曾主辦關於這次風災的展覽，我也曾參觀。他又提及香港淪陷時在深水埗集中營留下的小祭壇。聶主教的文章亦分享了正教的靈修及神學傳統的價值。這些都說明基督教的發展背後，有著重要的信仰因素在內。

